

张明华 著

中国古玉

发现与研究
100年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古玉

张明华·著



发现与
研究
100
年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 100 年/张明华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10
ISBN 7-80678-210-9

I. 中... II. 张... III. 古玉器—研究—中国
IV. 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593 号

封面题签: 汪庆正
责任编辑: 陆坚心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 100 年

张明华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26
出版日期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678-210-9/K·38

定 价	280.00 元
-----	----------

序 一

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燮君

世界上产玉的地方不少，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波兰等多有蕴藏，玉器的制作在一些国家也有不少精彩的发现，但质地最好的玉是中国新疆的和田玉，品种最丰富、历史最悠久者毋庸置疑也是中国。中国人用玉、爱玉、迷玉差不多有近百个世纪的历史，除了一大批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外，更产生了像“和氏璧”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宝玉的故事。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从相关资料和对欧美多国考察中，我们发现对中国文物十分热衷甚至饥渴的西方人，在他们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相对于瓷器、青铜器、石刻、佛像、绘画等庞大数量，玉器却屈指可数。这似乎与西方人艺术鉴赏的不同习惯有关，西方人往往擅长大型雕塑与绘画创作，特别注重视觉直观的造型艺术，而中国玉器往往以精致小巧稀贵优质侍奉把玩取胜。

中国优质玉材矿源的稀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好的玉器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稍有战乱和动荡阻滞了玉路，便可使一些历史阶段或朝代的玉器艺术出现空缺和低潮。玉雕工艺技术的私密性，使有些成熟的琢玉技艺难以传承，阻碍了玉器工艺的顺畅发展。造型艺术的本土化，如常见的大头童子等人物似乎与西方严格的解剖学相悖，在有些西方人眼里感到别扭。这只能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解释。

据史料记载，中国先民认为可以捧着玉器（琮、璧）与天地相通，与先祖相通；食用玉屑可以延年益寿、长命百岁，让死者口含一只玉蝉可以使人死而复生（蝉有由蛹蜕壳为蝉的生物学过程），穿一件玉衣可以永垂不朽；琢一个玉葫芦喻享“福禄（葫芦谐音，下同）”，刻一只蝙蝠在一枚有孔眼的古币上面，口彩为“福（蝠）在眼（钱孔）前”，雕出花瓶腹内插三把戟就是“平（瓶）升三级（戟）”，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甚至与一块“通灵宝玉”性命相系；另外，我们可以从先秦典籍和历代正史、笔记、方志、小说中发现大量关于玉的记载。玉似乎成了象征帝王贵族身份、等级及财富的一种标志，一度形成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习俗。《礼记》中把玉完全人格化：“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诤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十分玄秘的道家学说，周密系统的儒家学说以及人们在科学落后的年代产生的种种神学、巫术、宗教、迷信思想，则将玉文化推广、引申到匪夷所思、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独有的玉文化实在太丰富、太深奥、太复杂了！

进入了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爱玉、研玉方兴未艾，西方人对中国玉文化同样开始了兴趣。我们欣喜地发现像世界闻名的大英博物馆最近也布置了中国玉器的专题陈列，中国古玉研讨会也偶有举行。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的五十个年头，恰恰是由科学考古发掘古玉取得重大成就和科学研究古玉空前活跃的辉煌时期。然而相关资料比较分散，缺乏全面的归纳。实践呼唤理性的思考和相关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

张明华先生是我馆的高级研究人员，1972年进馆至今，一直从事考古工作，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手下，出现过中国最早的水井、石犁及一大批在中国考古界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玉、石、陶器和

遗迹。他撰写了《良渚古玉》等五六部专著，他的富有创见的《良渚玉戚研究》、《良渚文化琮形镯》、《司南珮考》、《良渚兽面为虎纹的又一重要例证》和《玉器时代之我见》等百余篇论文、文章在文博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可以相信由张明华先生撰写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这部集资料性、研究性、图典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专著，在新世纪的玉学研究中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3年11月20日

序 二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 杨伯达

《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的正式出版确是作者张明华先生个人精心耕耘的丰硕成果，作为他的同道，我对他的成功深感欣慰，同时并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此书所以能够问世，除了作者本人的勤奋努力之外，还有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所有文物考古工作者尽人皆知的，尤其像此著为个人成果，出版社的支持便更为重要。此外尚有尤为重要的客观条件，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我国考古工作者经过几代人含辛茹苦地科学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包括玉器在内的珍贵文物，这些数以万计的出土玉器对我们玉器研究人员来说非常宝贵，是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并给予我们以智慧，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我们的心扉，使我们隐约可见中国古玉万年的发展系列以及光辉成就。

今天，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我国长达万年的玉器史和玉文化史是经历了神玉、王玉及民玉这三大阶段。其神玉阶段起于公元前6000年，止于公元前2000年，玉器的占有者和玉文化的主宰者就是巫（覡），巫以玉（神物）、玉神器事神（祀神、媚神、飨神、求神……），接着传达神灵的旨意，玉、玉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王玉起于青铜时代的夏，盛于商、周，传至秦、汉后衍为帝王玉并延续到清代。王玉为帝王服务，功能以“瑞”、“器”为主，旁及其他，用途广泛，工艺精致，逐渐与社会生活贴近。民玉即士庶用玉，最早出现于宋代（960年—1279年），民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帝王玉的消逝，实际上是两者并行发展。士庶用玉虽受帝王玉的影响，但在服务对象与社会功能方面都与帝王玉有所不同，如帝王玉是贡玉，而民玉为商品，故在品种、形饰上各自都有着独具的特色。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逊位，不仅推翻了封建君主制，也彻底地消灭了帝王玉，开辟了民玉的新时代。

我们从璀璨斑斓的出土玉器中不难看出我国玉器、玉文化的高峰出现于神玉阶段，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神玉为其代表，这说明我国玉器的发育状况甚为正常，有着无比强劲的生命力。蕴藏丰富的玉资源是我国玉器、玉文化赖以发展的根本保障，可以判明的有珣玕琪、瑶琨、鬼玉、球琳和璆等五大原生矿及次生玉璞产地，形成了东夷、越、淮夷三大玉文化板块以及夷、华夏、羌、古巴蜀以及荆蛮等五支玉文化亚板块，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五大玉矿、三大玉文化板块及五支玉文化亚板块取玉、运玉和贩玉形成了玉石之路及其相联网络。夏王朝为起点的王玉及秦汉以后的帝王玉所用玉材以球琳（即昆山玉、和田玉）为主，通过昆山玉路将球琳运至王都。同时，各地方国与诸侯国取玉于附近或跨区的玉产地，所以玉石之路及其网络虽有变化，但仍然存在并继续使用。它还透露出玉器的艺术处理，如神玉的示意手法、王玉的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民玉的俗文化品格及贴近生活的艺术手法均为各阶段玉器涂上了一层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神玉阶段的玉器所概含的神灵的、巫术的、精神的、社会的文化基因可能极其广博而幽深，但又十分浅显易懂。何以言之？我相信只要以先人的生活和思想去理解其遗物，便可得出正确的认识，如史前人吃兽禽之肉和草木之果，或食粟米以维持生存，神灵要活下来也要吃东西，按《山海经》记“天地鬼神是食是飨”，说明神灵食玉便可长生不老。人死了他的魂魄不灭，生活于另一世界他也要吃东西，而“玉璧”不就是他的最好食物吗？“玉璧”取形于圆形肉片而更加规范，这也就是事死如生的最早的注释。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生”的意义及其死后的曲折反映并且以其解释神玉，则不难透过它的神秘外表而看到它的本来面貌，还原其本义。这就是“返璞归真”，“真”就是将社会生活浓缩到其内核，也就是“饮食男女”。若以

此四字去理解神玉阶段的玉器，可能比《周礼》记载、《尔雅》诠释更为客观公允，也更加接近真实。

上述看法也是我在研究史前玉器时梳理出的若干论点中的一个，再重复一遍，“事死如生”、“返璞归真”是打开神玉殿堂大门的一把钥匙，愿以此与考古、文物、博物馆的玉器研究家们共商之，言不及义或舛谬之处亦望方家教正。

我相信，这本《中国古玉》的出版为研究我国古玉的朋友们提供了宝贵的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专题性、学术性读物，其影响必将是积极的、深远的，也确是不可估量的。

2003年11月5日

目 录

序 一	陈燮君	1
序 二	杨伯达	3
前 言		1
一 美玉初识高潮骤起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3
二 巫神礼玉盛极一时的夏商周时代玉器		33
三 崇玉琢玉蓬勃发展的春秋战国时代玉器		62
四 大气磅礴颠峰雄峙的秦汉时代玉器		88
五 国度分裂玉事凋零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玉器		126
六 重现繁荣功能转化的隋唐五代时代玉器		134
七 民族特色风格迥异的宋辽金元时代玉器		147
八 百花齐放登峰造极的明清时代玉器		165
九 玉学理论		187
十 玉器综论		200
十一 区域、族属和特色玉文化		215
十二 纹饰、图徽与铭文研究		235
十三 历代琢玉工艺		257
十四 辨伪与鉴考		272
十五“玉”之定义、来源及鉴考		286
十六 玉器器物研究		299
注 释		358
后 记		406

前言

玉是火山运动的产物。在使用打制技术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只把它当作与一般石头并无多大区别的、用来制作工具或某些生活用品的原材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石器精加工技术——磨制甚或抛光工艺的发明，人们蓦然发现，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些会凸现出特别鲜丽的颜色、特别滋润的光泽、特别坚韧的质地、特别细腻的感觉。于是他们逐渐懂得把它们从普通石头中挑选出来，专门用来制作精美的装饰品或少数用途重要的器具，并朦胧地有了区别于普通石头的、玉的概念。至少距今八千多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的墓葬中，就有耳饰——玉玦出现。然而，玉材毕竟稀贵，取之不易，加工繁难，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阶层的情况下，美玉充其量只能提供给少数巫觋首领或王者享用。

在科技水平相当有限的年代，人们对日月风光、云雨雷电、洪水猛兽等自然现象，对衣食住行、农耕渔猎、生老病死等社会活动中的许多问题不认识、不理解。人们为了得到解脱、得到护佑，产生了许多迷信思想与愚昧的活动，现实生活中许多高山大流、奇树怪石、猛虎憨熊、毒蛇鸣蝉等，无不成为了人们顶礼膜拜、精神寄托的支柱。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玉料开发和玉器制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本来就印象深刻、美雅神奇的美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先民们寄以厚望的尤物。

考古发现证明，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崧泽文化时期，首先出现了无生产功能、无装饰意义的、纯意识形态的玉器——玉琰。人们可能期望其神力，使躯体不腐，灵魂升天。这也许是中国“七窍玉”最早的祖形。以后，随着人们在这方面意识的不断加强，以求得与天地相通，与鬼神相通，与先祖相通，美玉又成了制作礼器的首选物。

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及龙山文化的迅速崛起，使玉器的制作、使用骤然升温。从关乎生存祸福，专事天地、先祖、鬼神的法器，到表示权威、地位、财富的礼仪用具，从纤巧、玲珑、艳丽的装饰品，到用途至今朦胧、造型奇特的不知名玉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以及古人对历代用玉的严密、神圣的种种制度……令人不可思议！从此绵延不断地、紧密不分地、一发不可收地、灿烂辉煌地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整个历史时期，产生并形成了世界上精美无比、诡谲神秘、独树一帜的玉文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匪夷所思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不但善于创造奇迹，而且十分珍视和完善自己的辉煌。至少四千多年前良渚首领的墓中能見到崧泽玉宝的珍藏，三千年前的妇好墓中能見到紅山美玉的身影，甲骨文中已有“玉”字；先秦《山海经》、《周礼》等大量文献中，留下了丰富的玉文化内容的记载；汉字中与美好、与玉相关、用玉作偏旁的单字竟达数百个；乾隆皇帝一人写下的咏玉诗词就达八百余篇……近百年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阶段以来，通过考古界、学术界的不懈努力，成千上万、精彩纷呈的考古发现与见解精辟、视角独到的玉学研究，为我们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玉文化的客观面貌。这是一部沉甸甸、亮闪闪、神兮兮的辉煌历史。

前不久，文物局为了全面回顾中国文物工作的百年经历和成果，邀我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玉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由于受制于丛书规格有限的篇幅，内容上只能点到为止。事实上，写这种宏观性的著作，即使篇幅不大，在资料的掌握上也绝对马虎不得。为了保证质量，我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争分

夺秒地几乎遍阅了自己能够找到的相关的资料，摘要、归纳，忙得天昏地暗，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后顺利交稿。任务完成后，面对着手上百万字的原始资料，我突然发现，把它们整理出来，不正是中国玉器一百年（资料来源截止于2000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完整诠释与索引吗？这也是文博界、特别是玉学界亟需填补的空白。

为了尽可能区别于纯工具书那种过于简单的、条目内容干瘪的陈旧模式，在考古发现方面，我采用了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侧重点的简明导语之后，对典型发现甚或墓葬、某件玉器作较为详细（甚至十分突出）的报道，而形式、内容雷同、普通的资料只作简单的罗列；在研究方面，在介绍了面上的各个专题之后，选择一些创见性、代表性的成果、观点、器物等，特作重点摘引或归纳性表述，有些重复的、意义不大的，则一笔带过或省略。使这本书尽可能达到既有工具书的检索功能，又有内容起伏、丰满兼备的可读性。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要把历史悠久、内容庞杂、牵涉面广泛、从来就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中国古玉表达清楚，本来就是一件难事。现今要按严格的出版要求加以规范，则难上加难。尤其在器物定名和工艺术语方面困难更大，因为文博界对此从未加以规范。

如玉腰带上的一些玉片，今古学者、工匠简直各说各的。尾部较长的一片被称为“铤尾”、“铤尾”、“獭尾”等，其余数量较多的有称“玉带板”、“玉带版”、“玉铤”等，不一而足。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器，有称钩云形器，“勾”、“钩”两字从字义上分析，后者妥，但文博界似已约定俗成，几乎都用前称（类似的还有勾云纹）。玉牙璧、玉璇玑是同一器，认为是饰件或礼玉的择前者，认为是天文仪器的称后者。对此，笔者可以用一词统一，但在引原文表述时读者会找不到。“勾撤”、“勾彻”是玉工的同一种琢玉技艺的两种写法，可能是工匠的口头语的文字记录，谁对谁错也无从查起。“巧色”、“俏色”是玉工利用玉材的天然色差、色块琢玉，达到特殊效果的特殊工艺，从工艺上讲，“巧色”较妥，从效果上讲，“俏色”生动，但大家说的却是同一回事。明代玉界名师陆子冈见诸文献多为陆子刚，但其本人在玉器上自刻的暗款是“子冈”两字。另外如“佩”、“珮”两字在玉器文章中用得很乱，且器名用“珮”字较普遍。简化字“佩”涵“珮”义，本书为求统一，具体器名用“珮”，其他用“佩”。还有印钮的钮（纽）字也存在类似情况。另如“蹻”字不能简写，“巫以蹻为脚力”。总之，类似的、让人手足无措的、不知所从的东西很多很多，虽然有些可能是作者无意写下的，但不少是诸家有自成一说的观点或定论的主动选择，擅自修改会强加于人，会产生不必要的错误（因此，正文中摘自各家之说的器物名称与我写的图片说明中的名称便往往不一致了）。笔者只能权衡利弊，改或不改或加注释，见机行事了。

我国地域宽广，行政区划在数十年间不断变化，特别是前些年大量的县转市，因此，地名的表述便无法前后一致（例如同一地域前后隶属不同省市，或同一地名前为县后为市等），只能以发掘时或撰文时的地名为准，前后不同也只能维持原样了。

一 美玉初识高潮骤起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提起“新石器时代”，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都有原始落后的感觉，要与精致、滋润、稀贵、神秘的“美玉”一词相联系，似乎不可思议。然而事实证明，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分布范围之广，发现数量之大，以及其呈现的高超水平和赋予精神领域的重大影响，都是令人惊讶的。当然，这里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这应该与我们的祖先在跨入文明之际，巫术盛行、礼仪渐成制度分不开的，也与对玉、石的认识明显有别和进一步提高分不开的。玉有神圣、永恒、美好的意义，此时将其制成精美的饰件，制成神秘的礼仪器具简直是天造地设，完美无缺，适逢其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由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以精灵神秘的细刻纹装饰的浙江反山“琮王”为代表的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器，以长鬣飞扬、气魄奇大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为代表的内蒙古、辽西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同时也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当然，要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人们最关心的是它的考古发现，因为考古发掘资料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这也是人们领略、研究中国玉器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在几百、几千年以前已有人获得过，至少1986年江苏吴县吴国窖藏中已见残损的良渚文化玉琮的身影^{〔1〕}。浙江杭县历史上以“产玉”闻名，“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为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竟达百余件”^{〔2〕}……可是获得者们都不能如今天考古工作者一般作出科学记录，以发掘出文物本体以外的众多信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发现要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出洋归来的留学人员的参与才得以开始的，如梁思永先生在1930年黑龙江昂昂溪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等。

中国的玉器，我们可以上溯到六十万年以前“北京人”已经使用了的、广义上的玉器——水晶工

具，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内蒙古兴隆洼、辽宁查海的狭义玉器——软玉器，它们都是些形制简单的玉凿、刀等工具与玦、环装饰品之类。及至造型奇特、工艺繁复、用途广泛的良渚文化玉琮、璧、钺、戚、山字形器，红山文化猪首龙、勾云形器、箍状器等礼玉、组合式项链、浅浮雕细刻纹手镯饰件之类呈现新石器时代的辉煌阶段的发现，则要晚至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是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文明萌发阶段。反映在玉器出土资料的地理位置上，虽然几乎遍及全国版图，然而重大发现都集中在新石器文化发达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和辽西地区，即被不少学者认为晚期已进入文明阶段的良渚、红山和龙山文化之中。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 意识形态的需求是主观因素上的重大催化剂。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形态已处文明萌发阶段，人们的美学观念、意识形态、礼仪制度已趋向更繁复更高级的阶段，特别是巫觋、显贵甚或开始凸现的王式特权人物，已经不满足于原有的一般的木、石、骨制礼仪用具，急需一种更新型、更稀贵、更神秘质地的器物加以提高和拓展。在金属冶炼技术尚未发明或未及实用阶段之际，人们只能依赖自然界已有的物质。而距今七八千年时已被人们发现并区别于普通石头，作为珍贵物琢磨成装饰用品或某种神秘物的美石——山岳精英——玉，便成了最理想、最有前途的材料。

2. 炉火纯青的石器工艺向美石——玉器工艺驾轻就熟地转移，满足了关键的技术条件。

从技术条件上观察，新石器时代至今未见一件金属工具出土，使人们对先民精绝的琢玉工艺感到不可理解。其实，我们可能疏忽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新石器时代先民从旧石器时代距今几十、几百万年起就开始积累起来的徒手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连今人也难以企及的登峰造极的状态。汉代

许慎说：“玉，石之美”，是说玉石本一家，性质接近。先民摆弄粗糙的石头已能得心应手，打击磨砺、雕琢、旋钻更细洁、更坚韧的美玉，岂不异曲同工，更显轻车熟路？事实上，经过专家们的一些模拟实验与研究，有些看似非硬金属、非先进机械才能出现的效果，用一些十分巧妙的、意想不到的工艺手段就能完成，有些工艺绝技甚至沿用至今。

3. 大量软玉器的出现，证明当时已经找到了较大规模的矿源。

制作玉器，矿源当然是最根本的条件，然而直至五千年以前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只能出土数量有限的玉器，即使是富有者墓中也只见一二件小饰件。地质工作者鉴定，玉料大多是就地取材，是从出露山体石脉中砸挖下来的美石，属软玉者稀少，而不久后的良渚、红山、龙山文化玉器，多者一墓随葬几百件（组），大者高达几十厘米，重达六七千克，这在非玉矿山体中是不堪设想的。近年，地矿工作者在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了几乎与良渚玉料色、质完全一致的软玉矿体，为我们提供了可作佐证的材料。

由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发现，数量庞大，分布面广，为便于专业人员的归纳查核，以下的出土玉器资料拟采用相同、相近文化系统的集中叙述，然后分省市罗列，对一些特别重要或有意义的发现顺及再作必要的细挈。至于涉及的器物名称、文化归属，由于笔者不可能对原物一一过目及本人的认识水平，亦或尊重原文的作者，会有少数的不统一、不妥之处，在此须作说明。

长江下游地区

长江下游主要指今江、浙、沪、皖等省市的地区。东部，特别是太湖周邻及宁绍平原一带，地势平坦，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极宜人类的生存发展。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五六千年的崧泽文化，四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始终以各个时段和区域最先进、最发达的状态崛起在祖国的东南沿海，而这些文化的玉器工艺同样闪现出最灿烂的光彩。江淮地区，从大范围的地理位置上观察，这里主要是指长江下游太湖以西的宁镇和

苏北、安徽一带。距今五千多年的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以及其他一些类型的、与相邻文化互有交叉甚或融合的遗存，自有其独特的面貌和惊人的发现。

河姆渡文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首见于浙江宁绍平原上的余姚河姆渡遗址，早期距今约七千年。除了它独特的干阑式建筑，发达的水稻农业，第三、四层出土的玉器是我国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之一。用料中含莹石矿。器形有璜、玦、管之类，十分简单，小且不规整。类似的文化遗址目前报道不多。

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浙北地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的源头文化。马家浜文化的遗存以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下层为最早，距今约七千年，但出土玉器仅见管及坠两件小器；六千年左右的玉器则以玉玦为典型，璜少见，但数量同样不多，形式也十分单调。江苏常州圩墩、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下层都有此期玉器发现。

崧泽文化出土玉器略多，但一墓（即使是富有的墓）亦仅一二件，品种以璜为主，增见了玦、镯等。璜的造型有桥形、扁条形、半圆形多种；琕亦分饼形、鸡心形等。琕的发现似乎突破了以前玉器仅作饰件（未认识玉之稀贵的早期，将玉作工具，则另当别论），而呈现了神秘领域的用途，似乎为玉器以后在意识形态的重大作用开了先河。崧泽玉经鉴定软玉比例增多，有些则夹有石质，器亦不大，地矿学家考察，认为仍属就地取材。

良渚文化玉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发现，但真正认识它应当是七八十年代。首先是江苏草鞋山遗址，于1973年在198号典型良渚墓中出土了过去被认为是周汉、甚至更晚的玉琮、璧，从而使一大批传世良渚玉器得到了正确的归属，也让人们首次领略了良渚古玉精彩的历史风韵。八十年代初，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葬玉大墓多居人工堆筑的高土坛墓地上，一墓随葬玉项链、手镯、璜、坠等装饰品，玉琮、璧等玉礼器百余件。一些玉器上的细刻浅浮雕纹饰和奇特诡谲的造型，让人们们对良渚古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八十年代中期浙江余杭县反山、瑶山遗址众多的几百件（组）美玉共葬一墓的现象，还有反山出土重达6.5千克的、细刻有谜一般鸟和人兽纹的“琮王”，以及豪华型冒镞组合玉戚和一大批山字形、柱状等纷繁形式和刻画的玉器，使人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琢玉文化的观念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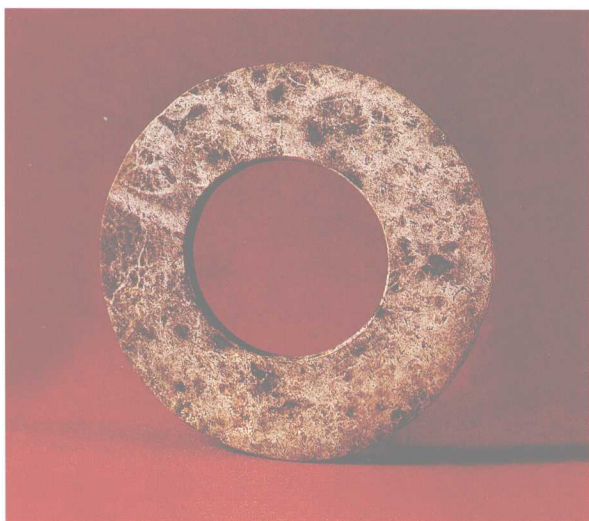
根本性的改变和飞跃。

北阴阳营文化发现于江苏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与崧泽文化时代、风格多有相似之处。玉器有璜、管、玦、环、坠、泡等。有学者统计发现，墓葬中三分之一的随葬品是玉器，其中璜占34%、管占29%、玦占16%、坠占13%、环占6%，余泡、珠、条形饰占2%。人们盛行以璜为佩饰和玦为耳饰的习俗。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它们的质地多以玛瑙为主。近似的发现还有营盘山遗址，位于南京浦口区，与北阴阳营遗址隔江相望。玉器与之相比，扁条形璜明显减少，半璧形增多。外缘锯齿形花边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风格接近。是顺流而下的影响，还是本地文化的原创，尚需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进行考量。

薛家岗文化，见诸安徽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出土玉璜、铲、环、管、琮等。这一文化遗存经碳14测定树轮校正距今五千多年。其中一件外方内圆的琮形器特别引人注目。中国的玉琮自良渚文化骤然出现并大量使用，乃至绵延了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是一种有令人不可思议影响力的器物，粗粗统计有关玉琮的专论文章，至少几十篇，涉及论文不计其数，然而，至今无人找到令人信服的良渚玉琮的可靠前源祖形。薛家岗玉琮虽然形制上小了一点，但造型上十分接近，而且时间上又早于良渚，因此是一件极有参考价值的玉器。

江苏省

江苏省跨长江下游的两岸，北与山东，西与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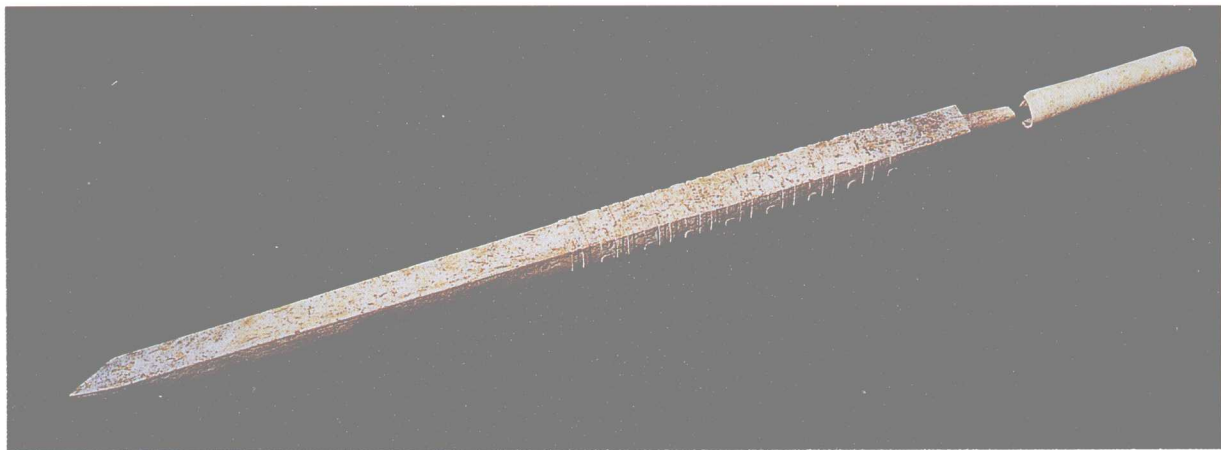
●玉环 大汶口文化 江苏新沂花厅遗址

徽，南与浙江，东与上海接壤，境内遍布着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江苏境内出土玉器的古文化遗址较多，由于地域宽广，不少地区还发现一些面貌独特或受域外文化影响的现象。

江北的古文化遗址不少，受其北来的大汶口等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反映在玉器上却不甚明显，反倒有突出的、南来的感觉，这也许是良渚等玉文化特别发达所致。

新沂花厅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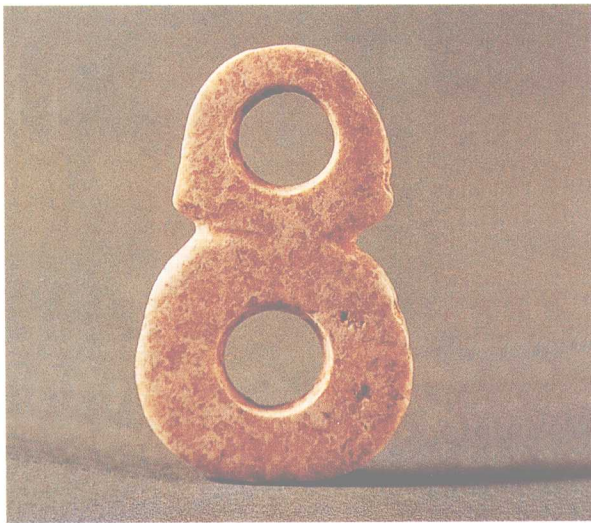
1953年发现了玉镯、玉环、玉珠、玉管、玉锥形器等十八件^[3]。1987年发掘出土了玉琮、璧、珮及珠管等饰物组成的玉项链计一百五十件(组)^[4]。1989年出土的玉器更为丰富，达到了四百三十一件(组)。品类增见了钺、斧和大型项链等^[5]。花厅遗



●锥形器 大汶口文化 江苏新沂花厅遗址

址地处苏北与山东交界，其中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玉器呈现出强烈的良渚风格（江南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四千年左右），随葬的陶器有强烈的大汶口文化特征（该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4450—6250年），为我们探索良渚文化与北缘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一直被人们称为小玉琮的方柱形简化人兽纹管形器，明白无误地出现在珠管组合玉项链上，说明这种玉管其实是玉项链上的组件。为学术界正确界定“玉琮”，提供了一类实物依据。

另外，马陵山小徐庄遗址，1998年出土大汶口文化早期玉斧、环、镯、璜、双环饰等^[6]。东海县蔡湖遗址，1960年出土大汶口文化玉璧、璜两件^[7]。灌云县大伊山遗址，1984年至1985年出土了马家浜文化玉玦、璜五件^[8]。1986年出土了玉珠一件^[9]。连云港藤花落遗址，1999年至2000年出土龙山文化玉簪、坠和锥形饰等^[10]。海安青墩遗址，1978年和1979年出土了良渚型玉环、镯、璜、锥形器二十二件。其中有一件被称为双连玉环的，竟与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双联璧形制如出一辙^[11]，这是否喻示着红山文化南扩的重要信息？阜宁陆庄遗址，1975年出土良渚型玉琮、锥形器三件^[12]，1995年出土玉锥形器、坠两件^[13]。虽然数量不多，但良渚典型玉器和袋足鬲、实足鬲、渔篓形罐等能在长江以北的淮河边发现，为良渚文化北缘可能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邻连，提供了重要环节。高邮龙虬庄遗址，1993年至1995年间的四次发掘，在距今约六



●双联璧（环） 江淮地区原始文化 江苏海安青墩遗址

千年的地层中出土玉管、环、坠、璜、玦、镯、指环二十二件。据报告人研究，玉器全系输入品，这在以往报道中十分罕见^[14]。邳县刘林遗址1960年出土大汶口文化玉环、珮、坠七件^[15]。1966年该县大墩子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玉钺、刀、环、镯、坠等四十二件^[16]。

宁镇地区

宁镇地区出土的玉器与南北相邻诸文化的玉器略有异同，营盘山等遗址的出土玉器，甚至出现了长江中游文化的个别特征，这应该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营盘山遗址

营盘山遗址位于南京浦口区营盘山，与北阴阳营遗址隔江相望。玉器与之相比，扁条形璜明显减少，半璧形增多。外缘锯齿形花边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风格接近^[17]。是顺流而下的影响，还是本地文化的原创，尚需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进行考量。



●半璧形璜 江淮地区原始文化 南京浦口营盘山遗址

圩墩遗址

常州圩墩遗址，1972年和1973年出土玉玦、璜、管等十四件，文化属性尚未统一，有将其归入马家浜类型，也有称其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第二期^[18]。1992年发掘，出土崧泽下层类型玉璜两件^[19]。

武进寺墩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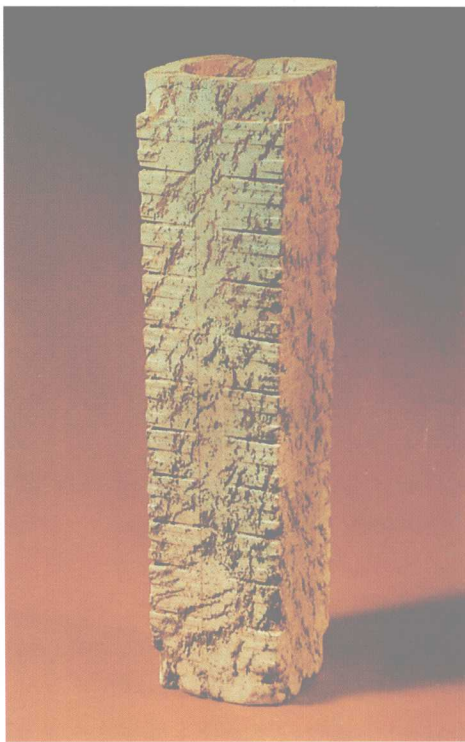
武进寺墩遗址，1973年出土过良渚文化玉琮、璧、刀三十多件，1978年9月出土玉琮二十多件^[20]，1978年至1979年又出土玉琮、璧、项链、钺、锥形器、冠形器共十一件，并在一件出土玉璧（M1: 1）表面发现了可能用于琢磨玉器的中介砂。这些砂粒已作矿物学鉴定，硬度超过玉石^[21]。现经常被学者作为良渚琢玉技术研究的参考物证。1982年出土玉琮、簪、镯、管、珠、璧、锥形器等一百十九件^[22]。这次发掘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号墓的一百零六件玉器，



●玉琮 良渚文化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

它们环绕铺垫覆盖在人骨架上下周围，且玉器中十三件有明显的火烧过痕迹，为中国古代神秘的“玉敛葬”一说提供了重要资料^[23]。以后又出土过玉琮、璧、带钩等六十七件玉器^[24]。寺墩遗址的玉琮、璧还有四十件左右是1973年至1985年间靠征集获得的，现藏常州市博物馆^[25]。寺墩遗址的重要意义不尽于此，有人依据遗址的布局结构出人意料地作出结论：“寺墩古国（遗址）是依照玉琮的形制来设计这座城的，寺墩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大琮。”^[26]

另武进的横林青墩、雪堰桥遗址也有良渚文化玉琮、璧出土^[27]。潘家塘遗址在1977年发掘获得马家浜文化玉镯、玦、环、坠多件^[28]。溧阳洋渚遗址，1982年出土过一件神人兽面的鸟纹圭，由于形制极似山东龙山文化玉圭，文化归属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29]。丹阳西沟居遗址1988年至1990年出土玉镯、管五件^[30]。南京北阴阳营遗址1955年至1958年的四次发掘，共获得北阴阳营文化（该文化分布在宁镇地区和皖东南部，距今五千年）玉环、玦、管、环、坠、泡、珠等三百七十一件^[31]，是我国出



●玉琮 良渚文化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



●玉玦 北阴阳营文化 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

土玉器较早且丰富的遗址之一。西善桥遗址1960年获得玉凿和玉饰共两件^[32]。高淳薛城遗址1997年发现一批北阴阳营二期文化玉璜、玦、管、坠等十五件^[33]。朝墩头遗址1989年出土了玉雕人像饰一件，为浅绿色玉，随一边角料施形，呈一大头小身体的怪诞造型，方脸、阔鼻大嘴、橄榄形眼，招风大耳，长发上束盘成大髻，向右上方耸起，双手抚胸，腿部几成棒形，穿有双孔，整器似为嵌饰。橄榄形眼睛与太湖地区良渚琮形镯上的人面纹眼形一致；抚胸双手，姿态与良渚“神徽”上的神人和安徽凌家滩玉立人如出一辙^[34]。金坛三星村遗址，1993年至1996年发掘，出土一些北阴阳营文化玉玦、璜、串饰等。其中一件用鸟兽纹骨牙器装饰柄首、柄尾的石斧，明显已属权杖性质。由于文化时段上早于良渚文化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35]。该遗址1998年又有玉玦、璜、串饰等出土^[36]。

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出土玉器的古文化遗址较多，但以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最具轰动效应。

草鞋山遗址

吴县草鞋山遗址，1956年普查中发现了一批玉器，1972年和1973年两次正式发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玉环、玉镯和玉玦，崧泽文化玉璜、玉玦和玉坠，良渚文化玉琮、璧、管、珠、镯以及玉料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然而，1973年6月26日却是个对良渚玉器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草鞋山第198号墓中首次发现了泥质黑衣贯耳陶壶、T形足夹砂陶鼎等一批最典型的良渚文化陶器，与

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汉周文物的玉琮、璧等器物一起出土。江苏的考古工作者以他们的出色工作，重大的发现，拂去了良渚玉琮、璧等良渚古玉上的千年尘埃，还这类玉器以古老而又绚丽的本来面目，让学术界掀起了认识良渚玉，探索良渚文明乃至中国文明起源的空前高潮。



●玉琮 良渚文化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

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们在如此重大的成绩面前，只平平淡淡地用二十个字小结了这一在文博界看来是惊天动地的收获：“玉琮、玉璧与薄壁黑陶、黑皮陶是同一时代的東西。”^[37]这并不是简单的谦虚、矜持，而是一字重千斤的科学论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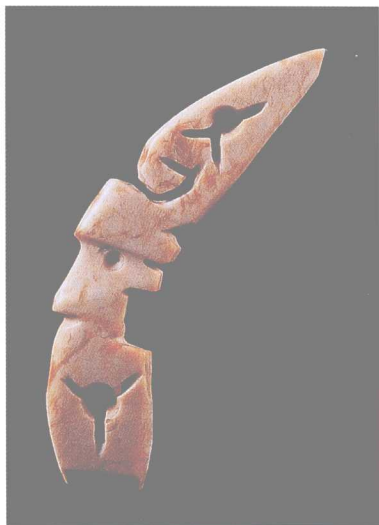
张陵山遗址

吴县张陵山遗址，1977年发掘，出土崧泽文化玉斧、镯、环、管、珠、坠；良渚文化玉琮、瑗、环、镯、管、璜、珠、觚、坠、蝉及冠形饰等五十七件^[38]。其中一件圆形玉琮（严格地说应称琮形镯），因有琮形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及同地层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距今 5785 ± 240 年的偏早的数据，而时常被引为玉琮由镯演变而来的重要物证。以后又有两次发掘，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二十件^[39]。

另东渚遗址发现玉琮和玉璧，但资料不详^[40]。



●琮形玉镯 良渚文化 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



●玉鳐 良渚文化 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

昆山市赵陵山遗址 1990 年和 1991 年进行过两次发掘，良渚文化玉器出现在个别大墓中，有一墓出土玉琮、瑗、镯、簪、珠、管、坠饰等一百二十八件^[41]。绰墩遗址，1982 年发掘，获得良渚文化玉琮、斧三件^[42]。1998 年，出土崧泽文化玉璜、玦七件。玉璜均置于颈部，玦位于头骨两侧^[43]。1999 年又出土玉璜、耳坠、胸坠四件^[44]。少卿山遗址，1984 年发掘，出土玉琮、瑗、斧、镯等九件^[45]。1997 年又出土了玉璧、镯、珠、管等二十二件^[46]。常熟三条桥遗址，发现一件玉璧。黄土山遗址，出土玉琮、璧、镯、柱五件。嘉菱荡遗址，出土玉琮、璧五件^[47]。罗墩遗址，1993 年和 1994 年发掘出土良渚文化玉镯、珠、管、环、冠形饰、纺轮、玦等一百十六件^[48]。吴江梅堰遗址，1959 年出土马家浜文化玉璜、管等十五件^[49]。苏州越城遗址，1960 年发掘，出土马家浜文化玉玦、璜共两件；崧泽文化玉璜一件^[50]。龙南遗址，1987 年至 1989 年发掘，出土崧泽文化玉璜、珠和良渚文化锥形器等^[51]。张家港徐家湾遗址，1985 年出土崧泽文化玉镯、璜、玦、耳坠、半圆形饰、瑗（纺轮？）二十五件，良渚文化玉管，镯、珠三件^[52]。崧泽半圆形玉饰，是用璜、玦芯料改制成。许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7 年出土崧泽文化半璧形玉璜一件；良渚文化玉镯一件^[53]。南沙镇东山村，1990 年出土马家浜文化玉玦、饰件四件^[54]。江阴高城墩遗址，1984 年出土良渚文化玉琮、璧、臂饰、锥形器、钺五件^[55]。两件玉琮均两节，刻简化人兽纹，一件主纹周围填满阴刻云涡纹。锥形器粗短，锥

体下部隐起两组兽面纹。1999 年至 2000 年元月，考古工作者在此又获得良渚文化玉琮、璧、钺、锥形器、珠、管等一百五十五件。并规律性地发现在良渚大墓的棺板盖的“北端放一件玉珠或玉管作一标记”^[56]。

上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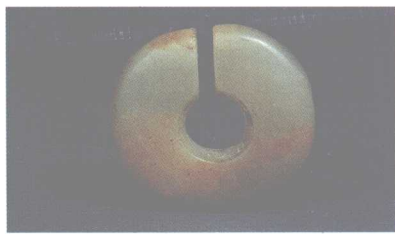
上海市，西北与江苏，南与浙江接壤，东临浩瀚的大海。西北东南向一条古冈身（古海岸线），把上海市一分为二。之东为六千年来形成的冲积平原，之西为古陆地（古冈身上的马桥遗址下层出土了良渚文化古墓葬），上海新石器时代遗址都集结于此。

崧泽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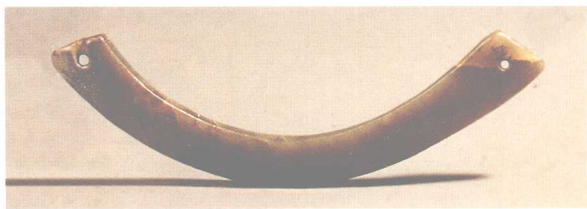
青浦县崧泽遗址，1962 年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出土马家浜文化玉玦一件；崧泽文化玉璜、璧、琕、镯等二十四件^[57]。由于崧泽文化墓地有一百多座墓葬，出土文物齐全，在太湖地区五千多年古文化类型中具有代表性，被考古界定名为“崧泽文化”，而二十多件玉器亦成了崧泽文化典型玉器。玉琕出于口中，既无装饰功能，又无生产、生活等的实用功能，显然有“七窍”塞玉锥形之意识形态的新的用途，良渚文化直接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几无缺环。因此，崧泽玉器又成了研究良渚玉器，特别是礼玉骤然发达的重要前源资料。

福泉山遗址

青浦县福泉山遗址，1982 年、1983 年至 1984 年、1986 年至 1987 年共进行三次发掘，出土了崧泽文化玉璜、管、坠、琕、璧共十件；良渚文化项链、



●玉玦 马家浜文化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



●长条形玉璜 崧泽文化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